

增加 GDP 为目的, 所以它总是要刺激消费, 甚至通过制造“虚假的需求”来刺激消费。我们现在实施的不是传统的现代化, 而是“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 对消费的这种一味地加以扩大和刺激的方针, 是不是需要改变, 以及如何改变, 这正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本来对此不难做出回答, 但由于“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并不是不要人们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 相反地它也是以富裕的物质生活为前提, 它也需要用消费来拉动生产, 创造出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料, 所以造成人们在消费面前失去了方向, 从而也使这个本来不难回答的问题成了一个难题。

我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去改变目前那种与生态文明不相容的消费模式。具体地说, 对待消费我们既要刺激, 又要引导, 即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去引导消费。首先要引导人们全面地满足自己的需求, 特别是精神和文化方面的需要。人的消费既有物质方面的消费, 也有文化方面的消费, 应当加大文化消费活动在整个消费活动中的比重。其次要引导人们在物质消费领域打断“更多”与“更好”之间的联结, 使“更好”与“更少”结合在一起。只要我们生产更多的耐用品以及更多的不破坏环境的东西, 或者生产更多的, 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东西, 那么, 消费得越少, 但生活得却更好, 这是可能的。为了实施“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 我们不仅要刺激消费用扩大消费来促使经济的发展, 而且更要引导消费, 让消费不至于突破生态容量的底线。

对生态文明概念的理论阐释

徐 春

(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一、生态文明概念的提出

从广义上讲, 文明是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制度和物质的所有产物。与野蛮相对应, 文明反映了人类战胜野蛮的过程, 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 它包括的内容和范围极其广泛, 是一个大系统。从狭义上讲, 文明偏重于文化含义, 指国家或群体的风俗、信仰、艺术、生活方式及社会组织。可以从不同角度划分文明种类。

从文化特性来看, 任何一种文明的存在与其特定模式的构成, 都是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互相“选择”的结果。因为区域社会生态系统不同, 地理、气候的多样性加上生物的多样性必然带来多样性的文明。以文化特性为核心, 英国学者汤因比归纳为 23 种文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归纳为 8 种文化圈: 即欧洲文化、北美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俄罗斯文化和东欧文化、印度和南亚文化、中国和东亚文化。从大的系统来说, 有的中国学者把世界文化分为 4 大系统: 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和欧美文化。再往大的方面归纳则可分为东方文明(文化)和西方文明(文化)。

从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即生产方式来看, 虽然世界不同地区文化特色多姿多彩, 文明发展进程有先有后, 每个发展阶段有长有短, 发展程度也各不相同, 但也有共同规律可循。以技术特征为核心来划分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历程, 可划分为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这样几个文明形态。前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

相比于前文明时期人对于自然的敬畏, 农业文明时期人对于自然的顺应, 工业文明下的人类俨然以自然的征服者自居, 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人口爆炸、粮食不足、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的困境, 就是人与自然矛盾激化的表现。由于人类对自身行为长期影响的忽视, 过度的工业化不仅严重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也使人类自身的社会环境受到了伤害和冲击。这种异化现象的产生, 深刻地暴露出了以工业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人类的环境要求之间的矛盾, 以一种后现代的方式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尖锐地提交给了全人类, 也使新的文明形态酝酿于工业文明的母体中。

20 世纪 70—80 年代, 随着西方工业化达到其最高成就, 以及它所带来的问题严重化, 特别是不良社会生产方式带来生态环境恶化, 促使工业社会面临历史性变革。在西方国家, 无论是社会学家对后工业社会的探讨, 还是科学家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努力, 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倡导的生态学世界观, 都在

同一方向上预示着工业文明因面临着多重全球问题,必将发生转型,走向新文明。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生态环境问题在前苏联理论界也受到极大关注和重视,前苏联学术界对生态文明概念的最早使用是在《莫斯科大学学报·科学共产主义》1984年第2期文章《在成熟社会主义条件下培养个人生态文明的途径》中,该文提出培养生态文明是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结果之一。前苏联学者当时界定的生态文明不是将其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而是将生态文明看作是生态文化、生态学修养的提升。

1987年,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在中国学术界首次明确使用生态文明概念。叶谦吉教授认为:所谓生态文明就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着和谐统一的关系,这是从生态学及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看生态文明。

1995年,美国著名作家、评论家罗伊·莫里森在其出版的《生态民主》一书中,明确使用了“生态文明”(ecological civilization)这一概念,并将“生态文明”作为“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文明形式。

二、生态文明的历时性和共时性

从历时性角度来看,生态文明将是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通常在每一个文明形态后期都因为出现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而迫使人类选择新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而每一次新的选择都能在一定时期内有效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对立,使人类得到持续生存和繁衍。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史螺旋上升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对工业文明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是对以往的农业文明、现存的工业文明的优秀成果的继承和保存,同时更有超越。生态文明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一样,都主张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但它又和以往的文明形态不同。生态文明是运用现代生态学的概念来应对工业文明所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局面,致力于利用生态系统生产的循环过程,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并通过改变生产方式不断地建设性地完备这种和谐机制。生态文明并不排除人类活动的工具性和技术性,但生态文明致力于对自然生态的人文关怀,创造生态恢复及补偿性的文明成果。

从共时性角度上讲,生态文明只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方面。文明是一个大系统,生态环境、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其中较大的子系统,它们在相互交错的运动中彼此发生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由于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的基础,因而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可以看做是其他三个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以生产方式生态化为核心,将制约和影响未来的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它将促使现实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向着生态化方向转变。生态文明建设必先始于物质文明建设向生态化方向发展,并首先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抓手,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而最终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得到提升,重构和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是具有层次性和阶段性的。

三、建设生态文明应有层次性和阶段性

从初级层次看,生态文明建设指的是在工业文明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用更文明的态度对待自然,不野蛮开发,不粗暴对待大自然,努力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认真保护和积极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通常意义上大多数人理解并广泛使用的建设生态文明的含义,也是生态文明所具有的初级形态。在推进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我们现在努力建设的也是这个层次的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最先阐述的是“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其强调的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含义,明显具有初级阶段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党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与保护关系的问题上,虽然提升到了文明的高度,但中国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工业化已经完成,促使文明形态发生转变的阶段。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高级阶段看,生态文明社会应具有这样几个明显特征:第一,在生产方式上,转变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生态技术为基础实现社会物质生产的生态化,使生态化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第二,在生活方式上,人们的追求不再是对物质财富的过度享受,而是一种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的生活。第三,在社会管理方式上,表现为生态化渗入到社会管理中,以合理配置资源为前提,公正、民主决策为准则。第四,在文化价值观上,对自然的价值有明确的认识,生态文化、生态意识成为大众文化意识,生态道德成为民间道德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生态文明社会的这些特征并不是全新的,而是在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修正和完善中建设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的社会经济政策为手段,致力于构造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社会为目的的文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既不能脱离人类文明的发展轨道，也不能脱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实际。经过 3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进入高速发展期，既有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明显特征，又带来“时空压缩”的复杂性问题。早期工业化生产模式的粗放性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代价，而作为后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已无向外扩张资源、输出污染的条件，结构性、复合型、压缩型的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和复杂性以及艰巨性应有充分认识。

中国处于不发达的工业文明阶段，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异常严峻。如果能够认真吸取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和先进技术，转变工业发展模式，采取有效的制度管理措施是有可能实现走生态文明路，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跨越式发展。我们的有利条件在于，第一，有西方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可吸取，使大量尚待开发的工业化项目提高产业层次；第二，中国农业文明中天人和谐理念和养护自然的优秀传统可继承发展。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意志力和执行力。

公平的财富：走向后发展之路

沃尔夫冈·萨克斯

(德国乌珀塔尔气候能源和环境研究所研究主任)

欧洲在 19 世纪崛起并居于世界的支配地位，是否得益于理性精神、自由制度或者温和的气候？肯尼思·波默兰茨提出了一种“环境的”假设。他认为，英国和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相比较，在 18 世纪末期同样面临着缺乏能够提供食物、燃料和物资的土地，而英国之所以发展起来，关键在于英国开发了海外殖民地并动用了化石资源。如果不动用遥远的地质时代和地理大发现的资源，工业社会就不是现在的样子。

一、发展的两难处境

从事后来看，欧洲的发展道路只是一个特例，不是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复制的。因为 19 世纪和 20 世纪欧洲可支配的化石和可再生资源无法得到。化石资源不仅短缺，而且化石资源的使用和生物资源储备的使用都在损害地球的环境。

然而传统发展模式使得世界处于悲哀的两难处境。因为化石资源驱动的发展已经在结构和心理上扩展到全世界，不能简单地叫停。欧洲—大西洋的发展模式影响了南方世界的欲望，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同的但却是较好的可见的实例。一般国家都想达到工业现代化，成功社会的特点是购物中心、钢厂，免费公路和工厂式的农场。尽管政治和经济上去殖民化了，思想上去殖民化尚未发生。欧洲—大西洋文明塑造着世界的设想是 21 世纪的悲剧。

中国是世界上需要殖民地和碳的最显然实例。中国无疑是传统发展的成功案例，然而中国的成功对于地球是一个失败。中国是美国之后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同时是第二大石油进口国。中国的发展在对世界资源造成巨大压力的同时，对国内居民造成压力更大。环境损害的年度经济代价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从传统发展的角度，富强之路直接导致过度使用和过度盘剥，高收入实际上意味着从环境掠夺型经济中获得了较大的份额。

汽车社会、高层楼房、化学工业或者肉食作为基础的食物体系很难普及全球。欧洲—大西洋的财富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能普及世界。换句话说，这种模式在结构上是不能实现正义的。因此，在 21 世纪，如果没有生态，就没有平等。

二、收缩和收敛

为了实现全世界的资源公正，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发展方式。

工业国家应当大幅减少他们的资源消耗量，世界的自愿公平主要依赖于工业国家是否能够削减对于全球环境的过分消耗。本世纪中期，过分消耗者应当削减 80%—90% 因其燃烧化石燃料而造成的空气污染。

发展中国家则会增加他们的资源消耗量。发展中国家有权利消耗足够多的资源，以满足其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但这种增加不应超出生态可持续性的底线。自然的限制决定了公平的框架。